

我們如何與世界對話

張炳玲成大演講 2018・10・11

成大中文系／翁文嫻

十年見證戰場上的生死人生

翁文嫻：

我們今天非常高興，因為「說理型寫作計畫」的資源，請到香港一位很有名的記者，張炳玲老師，來到成大「通識國文」課堂上，跟兩班同學見面。她今天的題目是——「我們如何與世界對話」。這位張炳玲老師，有很精采的經歷。我曾傳給同學們看，有讀到她在成大校刊，3年前，2015年刊出的一篇座談：〈幸福與靈魂體的追尋〉，那一次的對談是「我們對幸福怎麼定義」。

她說在希臘文裡面，幸福（Εὐταχυσία，Eudaemonia），是跟整個世界的認識，與你完成一些很大的事情有關。不是個人的，它在希臘原文裡面是這樣。她自己呢？在1995-2005年，巴爾幹半島及中東曾有很頻繁的戰爭，幾個國家不斷在互相衝突，那時她作為香港《明報周刊》特派戰地記者，哪邊有戰爭，她就哪邊跑。你們可以想像這種狀況嗎？十年她往巴爾幹半島及中東半島戰場上，作為一個年輕的戰地記者。2005年後來，就比較平靜，回到了香港，有很多也很精采的事情。她做了幾個地方的藝術展覽的平台。一個是威尼斯，一個是北京，一個是上海，一個是廣州。她做了四個「大石館」的藝術展覽平台。什麼叫平台？就是除了藝術家的作品展覽，她安排了很多場對談、出版刊物、一些據展覽內容跟觀眾互動的各種事件。她當時講太精采了，想不出這跟展覽有什麼關係？記都記不起來那麼多，我就覺得，她簡直是我提倡的「詩行

動」的一號人物。她做的好像都是詩的行為，不過沒有用這個名字而已。

今天，很偶然的機會，把她帶到成大，而且跟那麼多的學生（我們上次只有七、八個學生而已）。上次的學生都非常感動，是研究生，都畢業了。今天又是新的一群，我希望會出現一種很震撼的經驗。她最近的一個事件，你們知道，上海有一個128層高的一棟樓嗎？我們的101很高，但是已經排到第7名了。現在有一個128層高的一棟樓，裡面的第一、二、三層，是「上海中心展覽館」。從去年11月開始，開館展覽籌備，就是張炳玲老師去聯合策展及總執行的，它的名字叫做「絲路敦煌・幸福生存」。內容是首次利用高清技術複製3個代表不同時期的敦煌石窟及動用了中國甘肅省7大博物館共106件套文物合成展覽內容，再加上對展覽的新概念「立體展覽新時代」，把空間無限擴闊並脫離平面展覽形式。

她說，為什麼在敦煌，當時人千里迢迢去到一個沙漠，這麼困難，做了這麼驚世的，一直到現在都永遠被我們膜拜的，那麼好看的洞窟與雕塑神像。那些人想的是什麼？他們那個時候、那個時代的人，對於未來、對個人、對世界的認知，可能跟我們時代完全不一樣。她就希望在一個最高、最現代的大樓裡，找到一個遠古遙遠的人類的一些特質。她做了這麼一個展覽，從今年的4月26日開展到明年的4月。等下聽聽她講，好，我們用最熱烈的掌聲歡迎這個戰地記者。（鼓掌聲）



「屍體能從我死的地方運回香港 那就是我買的保險」

張炳玲：

謝謝，大家好。因為這兩週到臺灣，剛好路過臺南，翁老師就說，能不能在這裡跟同學們分享一下，我最近做了啥？其實，她剛才把我很多事情說了。今天分享一些什麼呢？我1988年開始做記者，可能你們還沒出生。翁老師與上次聚會的老同學曾問我：「為什麼要跑去戰場？做戰地的新聞？」我說，原因很簡單，因為我很愛香港。我一直這麼說，雖然是笑著，但那是很嚴肅的。因為只有愛你的地方，才會為一個地方做點東西出來。當時我做媒體，不願意香港人看新聞，都是從BBC、CNN裡面出來的。我希望從香港人的角度，去看一個外地、外國的新聞。不知道你們對國外的新聞，有沒有關注。有沒有想過，為什麼沒有臺灣的記者，為你們跑這些新聞？那時候，我就跟總編說：「我要

去波斯尼亞。」所有人都覺得我有神經病，因為開始去戰地的時候是1995年，你們應該出生了。總編對我說：「你別去，其實你在香港做專題報導很好，安心工作吧。」我做記者開始就是做專題報導，《明報周刊》的時候，我一次專題報導得用上20幾個版，來寫一個故事。

我的背景，不是跑每日新聞，不是跑每天新聞，從開始，就做專題記者。當我提出要去巴爾幹半島之後，總編只是很簡單跟我說：「好啊，你可以去啊。但是你要先買個保險。」大家可能不知道，戰爭地方基本上買不了保險。所以總編就給我一個最大的難題，如果你買到保險，你就可以去。之後我就努力找，最後被我找到了。保險很簡單，就是如果我死了，屍體能從我死的地方運回香港。那個就是我買的保險。其實你看CNN啊、BBC啊，他們都有自己的保險公司。



認清自己的IDENTITY身份才有自信 你的想像力、世界觀、價值觀就不一樣

我把這段經驗分享，是想讓你們知道：「認清自己的IDENTITY身份才有自信，對自己要有信心。有自信心，才會有想像力，為自己打開可能性。如果你都不相信自己，沒有人可以幫到你。」我可以這麼說，因為我是一步一步走過來。1988年離開學校去做新聞、做媒體，之後就一直一直做……但是做媒體是很殘忍的。什麼叫很殘忍？我出每篇文章，馬上就準備被評分了。懂我意思嗎？就是一出版，那時候香港才六百萬人，六百萬人都會看你的文章。好不好人家馬上就知道。沒得去吹，不知道臺灣有

沒有「吹」這個詞。就是，你沒得自己說自己很厲害、很牛、很什麼什麼……當你的文章一出來，人家一看，好不好就知道。我是從整個背景之下，一步一步，一直做到今天。所以，我覺得一定要有自信心，我也年輕過，我更明白，當你對自己有自信心的時候，你的想像力、世界觀、價值觀就不一樣。剛才翁老師說，我做展覽很有想像力，別人想不出怎去處理展覽的時候，在我經驗裡就可以找出來，會知道自己的identity。我的身分是什麼。你們現在應該是大學二年級、三年級，都一年級噢？那更年輕了。所以當你是大學生的時候想想，大學生的你的那個identity、你的一個身分，會給你以

後的生活，有什麼的變化。我覺得那是很重要、要思考的。

我們什麼時候才有發言權？

大學二年級時，都不知道阿富汗在哪。1985年，我讀大二，我帶著那時香港的各大學同學，一起去抗議。那時還有蘇聯（現在叫俄羅斯），入侵阿富汗。很難想像那時候我不知道哪是阿富汗。只知道，用武力入侵別國是不對的，所以在大學大專聯會中我提出組織香港大學、中文大學那個時候的兩所大學及其他大專院校一起去抗議。為什麼？因為我知道，當我是一個大學生，我一定要對世界有感覺及回應啊，如果對這個世界沒感覺，對我來說還有什麼意義呢？來一個文憑，對我有什麼關係呢？所以應該從你們一年級，就開始想identity的問題。

你們是臺灣人，臺灣人在世界是怎麼打開這個局面？在外面看你們，中國大陸壓迫著，所有國家跟你們斷交。其實我很著急的，不知道你們怎麼處理這些問題？你們的identity怎麼去思考？我們不是政治家，不可能有很大的權力在手上。但可以從生活裡面，一步一步打開我們的局面。就今天看，就幾十個人吧，一起來打開一個局面，一定可以的。不一定所有人都真去搞政治，但從你們的專業裡，就可以打開。記得在採訪荷蘭建築師Winy Maas的時候，我問：「什麼時候才有發言權？」你知道嗎？什麼時候有發言權？他回答說：「就是當你做到專業得人家不得不找你的時候，你才有發言權。」要專業到人家不能不找你，你就有發言權了。如果你平平凡凡，只能跟著帶隊、跟著潮流一直走，發言權離你很遠，只能在小圈子吐苦水。我對大學生還是有特別大的期待，期待你們。我覺得大學跟中學很不一樣，到了大學，責任都放在你身上，以後社會就是你們的了。我們都會退，我們上來，前輩都要退後。他們退後，不一定要排擠，而是我們承接了他們的腳印同時展開新的世代。於是我們這一代，把以前的更新，變成不一樣，可以從根一直一直燒上來。我覺得那很重要，你們來學校才有意義嘛！

一開始，很多同學喜歡問，什麼戰地槍林彈雨的故事，我少說一點。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一「想像力」，這可以帶你們去到哪裡。我覺得你所有的想像力、創造力，有個基礎：「你能不能把你自已訓練成一個很專業的人？」不管你是掃地、清潔的也要專業，洗碗的也有專業。若你能把你的專業，變成自己很嚮往的事，那個才是重要的。我今天帶了個東西來，讓大家看一下。（首先播放了一本4年前我做的一本記錄香港貧窮線下的居住情況，書名：《住住先》（意思是暫住，但卻一輩子離不開）；另外放映7分鐘的片花，片名：《李二毛》（用了15年去記錄一個中國年輕人的由男想變性的人生歷程，也反映了作為大背景的中國這15年來對人權情況的變化，而作為16億人口中的一人如何與大背景及個人的掙扎。）

放映這兩套是因，我想告訴大家，不論哪都有社會問題存在，個人要去改變大環境很困難但又是必須要面對的，沒有人能安身於外。我們的身份與專業就是我們的發言權。

我的香港，其實是很悲哀的

我是從香港來，帶來了一本在香港做的書《往往先》，看看我們的香港，其實是很悲哀的，號稱國際金融城市，庫房每年千億盈餘，萬億儲備，很多國家的儲備都比香港少。

我剛看facebook，說我們的特首，（特首就是，香港有700萬人，能有選票能選特首的選委只有1200人，我就沒有那個權去選她。她是從1200選委裡面，777票當選成香港特首的林鄭月娥。不是像你們，一人一票，我們沒有，就只有1200人，1200人裡面777個人選她，就變成了特首。）她昨天宣布了要做人工島解決未來人口所需的土地需求，我要先讓大家知道一個現實，自從1997年回歸中國後，中國政府自把審批權，香港政府無權過問，每日，是每日有150位中國的人來香港定居，回歸21年，我們已經接收了110萬人來香港，即是新香港人，因為這樣的人口增長，現特首把香港的儲備金一萬個億，很大的一個數字，一萬億，做人工島去解決住房問題。不在

源頭控制來港人口，問題永遠都在。氣候的變化與不測的大自然，人工島存在環保問題也存在危險指數高的工程問題，你看日本關西機場及杜拜人工島陸沉的情況就知道其能產生的不可預測性。現在正有很多人去抗議，但是肯定不會成功，因為立法會裡面，過半數都是親政府，基本上你反對是反對不了的，肯定這一萬個億就沒了。

但正如我剛說的那本書，貧窮人是怎麼住。那本書的名字叫《住住先》。廣東話裡面有一句，以為只是在這裡住一會兒，但很多人就在這些環境裡住了30幾年半個世紀，可能到他死的那一天，才離開。你在圖片裡面看到，一個床位的租金大概一萬五千塊台幣，裡面的人都是收入很低。從房的租金價錢，我們用呎計算，每一呎價比半山的豪宅更貴，因為地方小。現在越來越多人住，以前是兩層床位，現在有些是三層床位，只在愈住愈小才能付得起租金。現在不只是老人住，連年輕的也付不起，只好住這些，這裡就產生了很多不同的問題，如何結婚生小孩，如何面對自己以後的生活等等。

為什麼對住這種房的人特別有感覺？因為剛做媒體時，1988年，曾採訪一個住在籠屋的人。「籠屋」的意思是，因為他們怕東西被偷，所以把自己的床前面纏了鐵絲網，變成了一個籠。我用三個月的時間去採訪住在籠屋的人，其中一個70多歲的，他說很多香港大型的地標建築他都有份。就是說，做建築工人。現在他年齡大，已經不能再出去走路了，每天都是靠鄰居，把他買外賣飯回來放在床邊，讓他吃。有一天我去看他，那個飯盒仍在床邊，但人不見了。旁邊的人說：那個人已經走了。我那個時候特別難過。一個人為香港貢獻了那麼多年，他的晚景及最終是這樣結局。

用什麼來對應打動你的人與事？

今天分享這些走過來的故事，是希望你們明白，我曾經被感動的片段，這些片段成為日後的我的種

子。被感動很重要。當什麼都無法把你情緒跳動起來時，這個世界就與你無關。所以，要敏感，當有東西打動時，要好好抓住那個情景、那個人物、那個事件，記住為什麼你受打動？他觸動了心裡面哪個領域？就好好的想。如果你不這樣想，你怎麼有想像力、怎麼有創作力、怎麼有可能性？你就變成，人家跟你說什麼，就以為我就是樣的。人家跟你說A，你就說你是A。人家跟你說B，你就說你是B，但其實是YXWZ。

我第一次碰見住在籠屋的人，才20幾歲，該比你們大個五、六歲吧，那時剛畢業。到今天，我對這些人還是很有感情的。當我那份感情出現時，我不單是關心，還要把感情成為世界的體現，公平、公義與愛，這些價值觀。我這麼在說的時候，就想打開你們的思考，生活過的十幾、二十年裡面，有什麼東西特別打動你？如果你跟你自己說：「沒有東西可以打動我。」你就好好的深思每一個碰見的人、每一次遇見的事，你內心有過的躍動。因為你碰見的時候，不就這麼容易把它放走。由於我對人很有興趣，覺得每人生出來不一樣，經歷也不一樣，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故事。如果我有更多時間，你們每個不同的故事可以跟我說。

人是特別有意義的，你別把自己放棄，放棄到不知自己是什麼。「尋找自己」還是你自己的責任，可能老師都沒那個責任。我的專業是媒體，就用媒體的方法：用文章、紀錄片、或不同的方法把我看到人的一些事，把它紀錄下來。為什麼會出現這個方法呢？今天，用我自己的經歷跟你們分享。第一，你要把你自己的identity找出來，在你的identity裡面，什麼是最能打動你的？第二，當打動的東西出現，你知道之後，要用什麼方法來對應那個打動你的東西？用科學？還是用人文？用政治來對應它？想一個方法，去對應這些事情，那個「對應」，就是在學校裡學到的專業。這可能是你的學問、方法論，在你的大學四年裡面能搞定。

找到一個對應方法把感動的事情撐住

開始的時候放《李二毛》紀錄片片花你們可以看到我的對應受感動的方法。這個感動不是一天兩天，是15年的紀錄。這些就是我的方法，我對應那些打動我的方法與堅持。

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一個故事，我在香港讀中六（高中最後一年）的那一年去教書，那時候我17歲半，很年輕，17歲半的時候我就去教英文，我的學生有60個人，教兩班英文，學生基本上都比我大很多，30幾40幾歲的人。他們什麼人？那時候是八零年代，大陸很多來港家庭團聚的，很多都是來自中國大學的教授或者專業人士，他們不懂英文，文憑在香港又被不承認（我們還是英國殖民地嘛），就要利用晚上的時間去學英文。60個學生，我知道，只有英文比他們厲害，其他根本比不上。他們有些是工程師、中醫師等等。我發現，那兒60個人，有60個家庭，這麼多故事在我面前湧過來，我發現我承擔不了，解決不了他們的問題。17歲半到18歲的時候想，如果以後找工作，要能夠將他們的問題，不單是我張炳玲，放在更多人能面前一起面對，那就好了。就在18歲，閃過那個想法。之後我就去念大學了，但不是新聞系，我是念Methodology of History歷史方法，考古、文字學這些。大學畢業，去找工作的時候，以前的那句話就出來了，所以畢業之後我就去當媒體了。因為希望透過我的採訪、文字、圖片、影像（現在影像比較多），能把一些問題帶到面前來，讓大家共同解決。所以，我就找到一個方法，把感動我的事情撐住。當沒有方法把你感動的事情撐住，可能一下子就沒了。所以，今天感動的事情出現時，你有沒有一個方法承擔住？不要輕易放棄感動。之後我就選擇了做媒體。

總結我先前所說的兩點，一是要確定自己的身份Identity;二是，讓自己受感動尋找對應感動的方法。有一句話很重要：「你一定要找出一條路來，有路就有工作崗位。」有一條路，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工作。因為我知道我那條路，就是做傳播工作。

策展對我來說是一個流動的傳播。

很多人問為什麼改變？從戰地回來，2007年後停了兩年工作，2010年我在上海主編了一本全新概念的以哲學、社會學及藝術作為基礎的建築雜誌，名字叫「artech」；2012年開始，就轉身當上了4展覽館（北京、上海、廣州及義大利威尼斯）的館長及策展人。做展覽，是我的一個工具，不是我的目的。策展對我來講，只是一個工具，要把我的idea、concept以展覽及對話的形式傳播出去。我這個人從頭到尾都是一條路，雖然希望不是是死路一條，工作崗位是我實踐我那條路的工具，工具當然要用專對來把持。反正把路找出來之後，有時改變的是我的工具，千萬別把工具變成你的目的。你用好你的工具，就是你的本事。世界3大展覽，威尼斯雙年展，我做過兩次官方展，一個叫「水共和」，另一個是「文化聯合國」。等下會給大家看看這兩個展的PPT。

之前我說了今次演講的兩個重點，以上是第三重點，就是找出自己的路，也別把工具變成目的。

要把自己的路找出來，想做什麼東西？人生要投資在哪？每一天都是一個投資。也要用你的專對把工具用好，用好工具是方法不是目的。

威尼斯是個水鄉，我做一個展覽叫做「水共和」

在中國3個館工作了一年多，我為公司在威尼斯買了一個17世紀修道士的祈禱室作為我們的展館，到今天還是第一個中國藝術館擁有自己永久的展場。

我作為館長及策展人，開館展，我從「水」來思考。不知道大家去過威尼斯沒有？威尼斯是個水鄉，最後以「水共和」作為開館展的主題。

從不同角度來思考「水」。整個展我邀請了5位/單位藝術家、建築師及社會運動家參與。

油畫藝術家何汶瑛，他覺得只有在游泳，才是自己，在水裡面的自己沒有人干擾，要競爭也是自己。

裝置藝術家及女權主義社會運動家戴秀慧，她在東南亞很貧窮的國家考察「商業樽裝水」對女性的影響，因為商家與政府合謀，不改良水染污問題，及媒體散播商業樽裝水的功效，有些女性要出賣自己的身體賺錢，為了家人能買到乾淨的水飲用。戴秀慧以多媒體方式做了裝置作品。

水的這樣的情況，可能你們連想都不能想像。我自己是反對商業瓶裝水，因為，當瓶裝水變成一個商品，就是說，你要用錢才能買到乾淨的水來喝。你有沒有想過，貧窮人怎麼有錢來買乾淨的水啊？在「水共和」展覽裡，要提出的思考：「商業瓶裝水對貧窮女性的折磨」。

在長城裡面用冰做一個教堂

另一個藝術家吳達新，他偷偷在北京長城，找了工人，把一個冰教堂搭起來，思考什麼呢？他覺得這是「中西文化交流」。教堂是西方，長城是中國。中西文化交流最好就是在長城裡面做一個教堂，所以他晚上叫工人偷偷的去做，是用冰塊做的教堂，那個是冰教堂。當太陽一出來的時候，教堂就融化了。這個藝術概念很好。他的「冰教堂」作品以紀錄片形式擺在觀展者眼前。當展覽開始，館旁是威尼斯最大教堂之一，他們主教來看展，我就問：「主教，你怎麼看『冰教堂』作品？」他說：「很好，這真的是中西文化交流，你看上面的那個小草，因為冰教堂溶化了，水流到長城泥土裡，小草就都能生長了，中西文化交流不就是孕育新的生命嗎？」我說：「你真是一個宗教人，把整個層面用另外的思考了。」

第四位是廣州的建築師何健翔，他思考全球氣溫，說，可能有一天，我們所有地方都變成水層了。作為一個建築師，怎麼面對整個城市都是水？他就把廣州變成水城市。

最後一位是盧思騁代表的「一杯乾淨水」非政府組織，後來，盧思騁成了世界自然基金會（WWF）30幾年來，第一個華人總幹事。盧思騁與「一杯乾淨水」非政府組織以引人科技能力收雨淨化解決水的問題。

所以從我的策展理念，策展人不單是以升華藝術家的藝術觀點及概念通達觀展者的感觀與思考世界，更以立體多角度，突破平面展覽限制，以有限空間拉闊可創作性與可能性。

文化聯合國

透過做展覽，我用不同的方向，定主題後就會有不同的東西在裡面。在發展主題的同時，我必需用好我的工具，展覽的工具是布局、燈光、音樂、對外宣傳展示等等才能駕馭主題及其形而上的思考。

以我第二個在義大利威尼斯藝術雙年展做的「文化聯合國」，我先放一段給你們看看，整個裝置每個部件超過5米高，共重4-5噸，當時從中國帶到威尼斯工人共計8人，配合我們搭建還有當地政府的古建築工程師、力學工程師、公共安全部門及古蹟維護等官員，威尼斯對於所有古建築內搭建藝術品都有非常嚴格限制，不能以藝術之名為所欲為。（播放「文化聯合國」展品介紹短片）

利用這個時間，上堂通識，威尼斯雙年展，是現在世界三大展之一，是國際上舉足輕重的，威尼斯雙年展，已經有百多年歷史，以一年是藝術一年是建築為主題的。威尼斯雙年展是唯一不以商業買賣的

展覽，純粹以展示藝術及建築的新概念為宗旨。威尼斯雙年展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邀請世界著名策展人定一個主題，邀請世界藝術家或建築師參與主題展；另一部分是國家館，每個國家或者地區在威尼斯設常設館，目的是國家或地區挑選能代表的新概念展子，讓觀展的人能掌握各國的藝術發展情況；第三部分，是個別的藝術家提出的展覽，經過威尼斯雙年展籌委會評審，每年上萬的投展方案，成功能通過官方評審的「官方展」則只有少於50家。我們的「水共和」及「文化聯合國」就是官方展。一般過不了評審的展覽，會自創叫「平行展」。

說回「文化聯合國」，剛剛看到的展覽內容介紹短片是概念性很重的。展覽分三部分，「時光隧道Black Tunnel」漆黑的長廊，喻意人離開種族、宗教、經濟、政治取向、意識形態等等，回歸單純的「人」，進入第二層的展品「概念盒子Concept Box」，盒子內透過奧斯卡最佳音樂得主國際知名音樂人譚盾為展覽而創作的人聲加心跳聲的音樂作品，讓人在盒子裡重塑自己的身份，因為我們的身份往往是基於宗教、意識形態、政治取向等。在盒子的上面開了一個代表自由的天空，天空上就是第三部分的「飛船Flying Ship」飛船代表自由的飛翔及未來。同時，我們批評現在的聯合國都是武力的，對話的可能性很底，如果是「文化聯合國」，我們要摒棄的是種族、宗教、經濟、政治取向、意識形態，以人作為單位的，以文化作為起點的聯合國。

展覽期中看展覽的，大部分都是西方人，很多人在裡面逗留兩、三個小時，不知道在他們在想什麼。有些人在哭、有些人在默想，我相信「文化聯合國」引出的思考正共鳴著現代人的糾纏。

藝術觀照世界

威尼斯雙年展外，在2年間，4個館，我做了超過18個展覽，進行了50多場的對話及活動。我打造一個流動的傳播的展館。

18個展中，有幾個藝術家，我特別想介紹給你們認識。

波蘭攝影家Tomasz Gudzwaty，一個很有錢的人，覺得自己太有錢了，能不能吃苦一點？他找到一個方法，去拍照。他就去一個地方，可能兩、三年，好好把照片拍好，讓大家看一下他的作品。「跑酷」，看到一個東西然後跳過去，他這一組的作品看到人對障礙物的挑戰心理；另一組是「印度人打高爾夫球」，他們不分貧窮富有，天台、行人道、市集都打高爾夫球，很有趣的，也一反我們認為高爾夫球是有錢人的玩意；「摔角」，如果最近有看那部印度電影，摔角爸爸訓練兩個女兒，就知道印度有這個傳統。我覺得做展覽能夠遇到不同人物、不同世界。「面具摔角手」是墨西哥黑幫釋囚的維生工作，他們戴著面具都是殺人犯、強姦犯，後來放出來沒工作，他們只能黑市打拳，同時又怕他們尋仇，所以就帶著面具。這些我以前不知道，因為這一組圖片的攝影家，跟他們一起生活了3年多，大家可以看見他的鏡頭，沒有什麼威脅性。

現實給你的夢想可有多少時間？

我再放一個PPT，是一個攝影雙人展，展覽主題：渺與秒之間其實有沒有我。兩位攝影家是黑明及范順贊。

黑明在中國是比較重要的攝影師，這一組叫「公民記憶」，他是怎麼拍的，你可以看見時間1955到2009年，他把1955年在北京天安門拍過照的人物，在2009年把他們找出來拍第二張，他是用一個方法來看中國大陸的改變。你看那些人的表情、衣服，

以前人多麼接近天安門廣場，現在多麼的遠。他就是用那個方法，把歷史、新聞記錄下來。你想想距離40年，能把一個人找出來，真的不容易，你看以前天安門廣場還能開車呢。當然40年過去，有些人死了，所以他就放了張椅子。每一個人物都有一篇關於40年的故事。

年輕攝影家范順贊，他以問問題：「現實給夢想多少時間？」作為拍攝的內容。他在問人的同時也在問自己。比如賣豬肉，問他的夢想，他就把他變成夢想的人物，做了一組圖片。那建築工人說，希望做一個建築師就化身成建築師……看一個好的展覽時，會看到很多不同的事在裡面發生，過程中，你能發現很多想像不了的，有很多能啟發你的東西。范順贊還有另一組作品，叫「在他們自己的時間裡」，作品中的人物大部份都是失去與世界溝通的能力，例如精神病人、老人、自閉症……

一線畫出星星

李新輝，一輩子都是畫星星。在他的星星作品誰能不能看見圖上的星星，從頭到尾只有一條線。

這個展覽，除了作品展覽，我還設計了一個藝術家與自閉症小孩以星星對話活動。自閉症的小孩（他們叫星星小孩）對星星特別敏感。在廣州邀請了50個自閉症小孩，跟藝術家一起來畫星星。結果是，藝術家怎麼畫星星，別人都看不出來，就只有自閉症小孩一看，就知道是一筆畫畫出來的，只有他們知道。

藝術家也是人，不能所謂高高在上，世界已經不是這樣看待藝術家。作為藝術家也可以分享創作過程的美好，在分享的過程，他自己也能學到不同的東西。在我的活動裡，很多自閉症小孩反而啟發了藝術家對星星的感覺。跟自閉症小孩的感覺衝撞的過程裡，我覺得那是特別美好的事情。

後來把小孩子們畫在石頭上的星星運到汶川災區重建的圖書館作為外牆的一部分。

「話語權」就能使我們打開不同的可能性

總結一下，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你們還年輕，有年輕人的優勢，如果不利用年輕，很快就不年輕了。可能20年、30年的時光就過去了。我常說地球越來越小，時間好像轉得特別快。今天，跟你們分享我從媒體，以致到策展的過程。當你讓你的專業越來越「專」的時候，就有更多的權力有話語權。那個話語權就是使我們能打開不同的可能性，我覺得很重要。還有把自己的想像力，飄得更遠，我覺得那個就是你以後最寶貴的東西。你現在年輕，但到50歲就年紀大了，80歲又更大了。最後能把握的是什麼？身份是什麼？你在地球裡面做了啥事情，我覺得那個很重要。不單是為了自己。自己太簡單了，只要找個工作，找個人結婚生小孩，之後就好好在家裡面，就一輩子了。但你想，生命裡有什麼東西曾感動你，願意把生命時間投資在裡面。不一定要做偉人，比如說，我就不是偉人，只因為我的生命，選擇了一條路，不同的工作就來找我了。之後我就用好我的工具，把我自己的價值觀、世界觀放出來，不管是我的報導、我的空間、想法或概領，交織創造可能性，我覺得那是比較美好、好玩的人生。

如要改變臺南，為臺南做點東西，你要打扮是全世界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危機感，但我有一個經驗，尤其是在香港浸會大學教書的時候，常常跟學生一起。當我在威尼斯，要做一個館、招聘人，那人要在威尼斯上班嘛，就來了很多不同的應聘。最後能想像嗎，有香港人、大陸人、義大利人，我是怎樣選合適的合作同事，我期待的是有世界觀有普世價值並帶著來自成長地的文化涵養的背景。那次應聘成功的是義大利來的，不只她來上班，還有的義大利的歷史、藝術及文化的化身。

因為全球化，你們的競爭對手很多，在香港，一年大學生有1萬5千人，臺灣一年多少人啊？幾萬？幾十萬？無所謂啦，大家以後再說。你知道在中國大陸一年大學生畢業是我們香港的人口，650萬。親愛的，一年大學畢業生，650萬啊，你能想像嗎？兩年的大學生是1千多萬啊，你臺灣才2千多萬人口啊，人家4年大學生就是你臺灣的人口了。

臺灣是有民主與自由的地方，你們一定要把自己放在全球來看，如果連知識分子及大學生也把自己看成一個小臺灣島，就沒辦法了。你們得把自己站在全球看，全球裡面，反問自己臺灣是什麼位置？當在一個職位空缺出現時，大陸有650萬人，香港有1萬5千，還有美國、歐洲來競爭，澳洲第二語言選擇已是「普通話」；威尼斯一年訓練能說普通話的是2萬學生，他們都是為了大陸市場。

我現在只是輕描淡寫的給你們一些資訊，但世界的確在發生這樣的事情了，對你們來講真不是一件小事，因為世界那麼大要打拚的地域這麼廣人又這麼的多，但你們不是有一首歌嗎，「愛拚才會贏」，作為大學生，你們要去哪打拚？肯定是跟世界打拚啊！只留在安全區臺南打拚，沒用的，因為對手會打上門。

臺南是你的根據地，為臺南做點東西，改變她成為一塊肥沃土壤，科技、人文都能滿地開花，但臺南不是你的世界，你要打拚是全世界的事情。你打拚的武器是什麼？帶著臺灣民主、自由及本土文化迎向世界觀及普世價值，以專業用好工具，爭取話語權，形成一套你與世界對話的語言。

起步從尋找自己的身份identity; 抓緊被感動的人與事的心靈震撼，找到一個對應方法把感動的事情撐住，走出一條路來；第三點是，以專業來用好工具（你的專科）爭取話語權，增加想像力，打開可能性。

希望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東西，大家能慢慢消化一下。

註：11000字演講全文同步刊登於成大校刊網站
<http://magazine.web2.ncku.edu.tw>